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
2003年12月，頁345~351

BIBLID1012-8514(2003)32p.345-351
2003.2.28收稿，2003.10.13通過刊登

§書評§

書評：鐘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臺北：臺北利氏學社　2002　12冊

李　天　綱*

最近幾年來，各地研究明末清初天主教來華歷史的學者們常常是懷著一種既羨慕又欣喜的心情，期待著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 S. J.）等人從事的中文資料整理工作。迄今為止，明清天主教的歷史，多是依靠西文資料寫成。用中文史料來確證和補充中國基督教歷史，是很多學者的願望。繼方豪、吳相湘等人於六十年代影印《天學初函》和《天主教東傳文獻》初、續、三編之後，到九十年代，又有新一代的歐洲和臺灣學者合作整理明清以來的涉教中文著作。一九九六年，比利時魯汶大學的鐘鳴旦、杜鼎克（Adrian Dudink）教授和臺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祝平一研究員等人編輯了一套《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由輔仁大學神學院影印出版。他們把原藏於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四〇年代末被耶穌會士帶到菲律賓，後又輾轉到了臺灣的一批中文文獻公諸於世。繼此之後，二〇〇二年，鐘鳴旦等人又編輯了《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以下簡稱《文獻》），由臺北利氏學社出版。這是一套更大規模的文獻集，學術研究的進步，有賴於文獻資料的不斷發掘，這套文獻集的出版，必將推動近年來已經蓬勃發展的教會史、明清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對此學界允有共識。

研究中國天主教和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學者一般都知道，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最多的三個地方是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的徐家匯藏書樓和羅馬的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是波

* 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
Institute of Religion, Philosophy Deparp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旁王朝的皇家圖書館，法國國王資助的耶穌會士有義務收集各類中文圖書，送回巴黎集中收藏；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則是耶穌會重回中國後苦心經營一百年的文化機構，神父們在江南、全國和歐洲收集了很多新舊書籍，崛起為資料重鎮；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掌控天主教文獻之樞紐，明清時期，很多渠道的中文文獻都會聚到羅馬，供教廷的宗教裁判所裁判。這三個圖書館的藏書目錄，在徐宗澤編定，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1939）書後附錄中可以查到。徐神父是徐光啟的後人，於信仰，於家族，都對明清天主教中文文獻情有獨鍾，是這類資料整理工作的先驅。二、三十年代，耶穌會主辦的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已經影印了書目中的一些文獻，但是限於當時條件，他們沒有能力影印全部文獻。

近三十年來，在天主教中文文獻陸續影印出版的同時，研究圈內還流傳著另一個好消息：在徐宗澤羅列的三個圖書館之外，同在羅馬的耶穌會檔案館也收藏了一批有關明清天主教的中文資料，數量不讓前三家，有不少還是三家所沒有的。設在羅馬的耶穌會總部，在明末清初本會活動高峰時期收集和保存了很多中文資料，他們的收藏是為了教務活動和神學研究，所以一直作為檔案，不向外界開放。除了一些特別允許之外，這批資料一直沒有公開給學者研究，因此學者們也很少知道這批特藏。幾十年來，相繼從事這批資料整理發掘工作的是美國舊金山大學的陳倫緒（Albert Chan S. J.）和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 S. J.）、貝勒大學的孟德衛（David Mengello）、澳大利亞學者魯保祿（Paul Rule）和比利時魯汶大學的鐘鳴旦、杜鼎克等人。

筆者在一九九一年開始接觸到這批檔案資料。不是在羅馬，而是在舊金山。在舊金山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的時候，已故所長馬愛德博士知道我對利用漢語文獻進行中西文化交流有興趣，便將部分羅馬檔案影印件提供給我，建議和鼓勵我利用這些資料從事明清時期「中國禮儀之爭」的研究。馬神父是耶穌會士，他提供本會檔案的時候，沒有建議任何結論和方法，只有許多幫助。馬神父的信任，以及這批資料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研究潛藏的巨大價值，令人動容，使

我義不容辭地在結束了訪問研究項目之後，放下其他工作，專事這項研究。當借用這些文獻，寫成《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時候，在感謝已故的馬神父之餘，也更加深切地體會到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文獻的重要。

明清史學者歷來重視檔案利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這批中文文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類保存了四百年的文字，那怕是片言隻語的信函、書契和題字，也是珍貴的，何況這是與儒家思想和天主教神學都有密切關係的完整著作和文獻。目前出版的《文獻》並不是該檔案館所收藏的中文文獻的全部，在浩大的收藏中，這裏皇皇十二冊，仍然只是選錄。該檔案館全部中文文獻的目錄和提要，可以在二〇〇二年美國紐約 M.E. Sharpe 出版社出版的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文書籍和資料（日本—中國卷1—4）：目錄和介紹》（*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Japonica-Sinica I-IV,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中看到。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中文書籍和資料，收錄在「日本－中國卷」的第「1－4」類中。和日本檔案放在一起，是因為中國開教在日本之後，而中國耶穌會開始時是耶穌會日本省的「副省」。五百年間，隨著耶穌會的興衰，該檔案館的文獻也經過不少次的聚散。據魯保祿的查考，館中有一份十八世紀編製的目錄，其中很多文獻現在都找不到了。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迫解散後，散失了很多檔案。此後，在義大利統一運動時期，耶穌會檔案甚至被運到了荷蘭，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回到羅馬。考慮到經歷了這番磨難，對目前還能夠保存這麼多中文文獻，我們就應該感到慶幸和驚訝了。同時，我們還會猜想：如果有更多文獻存世的話，那該又有多少章節的歷史需要補充和重寫呢？

到目前為止的調查和編目，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日本—中國卷」的第「1—4」的收藏一共還有五百八十種，中間只夾帶少量西文文獻，中文文獻占了五百二十種。臺北利氏學社這次出版的選集，總計有十二冊，選錄了其中的一百多種。據現在羅馬、巴黎、里斯本、上海、臺北等地收藏處公布的目錄看，目前存世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獻約有千種。學者們還想更加精確地確定這類文獻的數目和篇目，但現在世界各

地還陸續有新的發現，歐洲和中國各城市圖書館還沒有完全聯網，所以在這些資料都完整地影印公布之前，要做出一個精確統計還很困難。無論如何，《文獻》集這一次影印了一百多種，約占目前所知總數的十分之一，確實是相當有分量的舉動。

《文獻》編錄以明末清初為限，涵蓋了一五八四到一八二〇年間在華耶穌會士和中國信徒的著述，包括有羅明堅、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湯若望、潘國光、南懷仁、柏應理等傳教士的著作，也有徐光啟、楊廷筠、孫學詩、張庚、李祖白、張星曜、李九功、嚴謨等儒家天主教徒的作品。作品的內容分屬不同範疇，包括了基本教義問答、耶穌生平、儒家經典、中西禮儀、科學技術、醫學動植物、繪畫理論、教會歷史等，還有中國教徒為保持中國禮儀的辯護詞、向朝廷上疏的奏稿、中國修會的各種會規和耶穌會士日常使用的工具書等。

身在不同領域，懷抱不同興趣的學者會在其中各取所需，這批資料將會大大推動中國教會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肯定的。多年以來，歐美中國學界在糾正「歐洲中心論」的背景下，漸漸忽視了中國教會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研究，轉而挑選一些與西方社會和思想體系很不相同，與傳教士們了無關係的題目從事研究，柯文（Paul Cohen）教授名之為「中國中心論」。「中國中心論」在推進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的深入理解方面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但是如果中國學者也用「中國中心論」來聲張自己的主張，就很難避免陷入「民族主義」的陷阱。放在明清史中來看，如果論者運用各種理論來否認或排斥耶穌會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貢獻，就很難揭示和解釋那段歷史。我們似乎忘記了這樣的事實：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離開了和西方的關係，是很難說完整的。明中葉以後東南沿海地區與歐洲國家的接觸，很大程度上引導了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不談歐洲，中國只剩下半部明清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影印出版由傳教士和儒家天主教徒撰寫，被耶穌會士帶去羅馬收藏的中文文獻，本身就表明「歐洲在中國」的事實，意義重大。

限於篇幅，如何從五百多種文獻中選出一百種重要著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統觀十二冊目錄，揣度編輯者的選收意圖，他們或許是把

寫作時間較早的傳教大師作品，和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文獻作為兩個重要的選收標準。羅明堅是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還是利瑪竇的老師。在《天主實義》漸漸為當代中國學者熟知的時候，羅明堅的較早作品《天主實錄》還沒有正式出版過。這次印出，對學者瞭解利瑪竇《天主實義》的寫作背景有很大幫助。利瑪竇另外一本《聖經約錄》過去也沒有正式刊布過，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很多中國天主教的早期譯名是如何確定的。

徐光啟的《聖教規誡箴贊》引文和四篇贊文，以前見收於徐宗澤編《增訂徐文定公集》（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1933）。六十年代王重民編定《徐光啟集》的時候，以並不充分的理由，把這五篇都刪去了。這樣一來，一般讀者就難以察覺徐光啟的天主教徒身分了，以致於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者在「科學家」和「愛國者」之外恢復討論徐光啟的宗教思想，會被認為是很大的突破。這一次影印的徐光啟贊文的原刻本，將真相公布給學術界，相信會對今後的進一步的研究有很大幫助。據陳倫緒的《目錄和介紹》說，《聖教規誡箴贊》該刻本上面有印章「魏味篤印」，應該是本文的見證人，可惜這次影印沒有將這枚印章顯示出來，如果將來能夠查明這位原收藏者的身分，對搞清中國天主教史的一些細節將有大幫助。

文獻集第九、十、十一冊集中選錄了三十七件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著述。著者李九功、夏大常、嚴謨等人，是清初天主教徒為儒家祭祖、祀孔、祭天等禮儀活動辯護的主要人物。他們之所以出面為中國禮儀辯護，一方面是出於對他們儒生生活方式的維護，另一方面也是耶穌會神父們給他們安排的功課，請他們按中國人的理解，把儒家禮儀的合法性向羅馬的宗教裁判所作出說明。像嚴謨的幾份《草稿》，都是按著本堂神父的要求，為參加羅馬宗教裁判所的辯論準備的資料。正是有後一方面的原因，他們寫作的辯護詞，即這些已刊和未刊的書稿，主要都收藏在耶穌會自己的檔案館中。這些中文文稿中的觀點和意見，經過耶穌會士的理解和解釋，曾經向全歐洲發表，成為來自遙遠東方的中國人自己的看法，呈遞到教宗的面前，更影響了歐洲人對中國宗教和文化的認識。

在《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中，我曾經論證說：今天

我們廣泛討論的「儒家不是宗教」、「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基督教應該本土化」等等議題，都是在四百年前，因為「中國禮儀之爭」，由維護中國傳教利益的在華耶穌會士們提出來的。利瑪竇及其後繼者，都是把中國儒家思想解釋成「世俗的」和「人文的」，是喪失了上古時期宗教信仰原形的末世社會理論，然後他們要做的是把天主教的神學——基督論，加諸於儒家之上，形成東西方思想的神聖聯姻，恢復中國信仰精神。他們在歐洲辯護說，「寬容」儒家和儒家禮儀的做法，在神學上並不構成「異端」，而是文化的聯盟。「中國禮儀之爭」的意義太重要了，本叢書幾乎把這一專題的所有文獻都作了收錄，除了南懷仁（Verbiest）的《天主教喪禮問答》和《善惡報略說》。但是，如果不是篇幅的關係，而是因為作者是西教師，不收錄這兩分文獻就可惜了。在「中國禮儀之爭」的問題上，中國教徒和西方耶穌會士的中文著作有同等的重要價值，不收很可惜。

羅明堅、利瑪竇、徐光啟等重要人物的著作，以及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文獻，構成了《文獻》的主要內容。但是，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重要價值還不止這些。II，91A是徐光啟的《〈商書〉注釋》，該書稿摘抄和注釋了《尚書》中有關「天帝」的言論。這部書稿不見於王重民編輯的《徐光啟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徐光啟著譯集》。目前為止的徐光啟研究都還沒有提到本書。但本書沒有被收錄《文獻》集，未得見全幀，很是遺憾。

另一遺憾是編者未將耶穌會士的儒家經典研究作為一個專題，加以收入。眾所周知，耶穌會士研究「四書五經」，把中國思想傳向歐洲。在這方面，他們主要用西文著述，向西方讀者傳播。但是，在他們的學習、研究和翻譯的過程中，還是形成了不少中文著作，這種過程性的著作，有時更能夠看出他們的原始傾向，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就有不少這樣的文獻。III，2是殷鐸澤（Intorcetta）作序的中文和拉丁文對照的《中西字〈大學〉〈論語〉》；III，3.1是殷鐸澤翻譯的《論語》；III，3.2是郭納爵（da Costa）翻譯的《大學》。這些都是一六六二在江西建昌刻印的中國版式的書籍，是儒家經典最早的西譯本。在I，10，還有耶

穌會士翻譯「四書」時使用的底本：張居正注釋的朱熹《四書集注》。按魯保祿推測，這些書籍應該都是殷鐸澤一六七〇年回歐洲的時候帶回去羅馬的。一六八七年，根據這些譯本，後來編成了《西文四書直解》（*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在巴黎出版，見於檔案館編號III, 4。如果把這些後來學者已經很少見過的孤本著作印出來，對於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較哲學、比較宗教的研究就會有更大的意義。

所有的遺憾，都可能是篇幅限制造成的。不然的話，編者和出版者一定會把所有文獻都一攬子的影印出來。事實上，我們也在企盼《文獻》會有續編。早在九〇年代，西方學術同行開始發掘散落在歐洲和中國各地的中文資料的時候，美國貝勒大學的孟德衛教授就呼籲要使用這批梵蒂岡文獻。在一九九二年他和馬愛德共同主持的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中國禮儀之爭」的學術討論會上，就預言說這批資料將會改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此後，大陸學者如林金水和筆者、臺灣學者如黃一農、古偉瀛、祝平一、李奭學，以及不少歐、美、澳洲的學者們，只是部分地使用了這些資料，相關的研究果然大有不同。這次臺北利氏學社集中出版這批檔案文獻，不啻是學界福音，學者津梁。為此，我們應該感謝兩位編輯者鐘鳴旦和杜鼎克。他們兩人都是荷蘭萊頓大學著名漢學家許理和的高足，研究多年，發表過很多著述，自己也已經是成果累累的重要漢學家。他們為學界服務，從事資料整理，做的是功德善事。

臺北利氏學社主任魏明德社長主持出版和發行事務。這套文獻集不再是在歐洲滯留，而是回到中國，讓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都能較為容易地閱讀到這套文獻，所謂慷慨解囊，利氏學社之義舉是矣。

（責任編輯：賴玉玲　校對：陳徵宗　鄭坤騰）